

● 世界历史

二战期间美法矛盾成因析考

严 双 伍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严双伍 (1957-), 男, 安徽桐城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江汉大学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主要从事法国史和欧洲一体化历史的研究。

摘 要] 在二战期间的反法西斯盟国关系中, 美法矛盾尖锐深刻, 引人注目。美法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包括美国对夺取战后世界霸权的战略追求, 削弱孤立英国、防止英国与己争霸的考虑, 控制法国殖民地、属地的意图, 对法国政治现实和未来走向的判断失误, 信息不全、情报不确导致决策的盲目性以及罗斯福和戴高乐之间不和谐的个人关系等因素。

[关键词] 战时; 美法矛盾; 析考

[中图分类号] K1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04-0441-08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对外政策, 从总体上看, 是比较成功的。这种成功, 既表现在它较广泛地团结了世界各国进步和正义的力量, 顺利地进行了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 也表现在它使美国成功地由一个地区强国一跃而为世界头号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霸主。当然, 前后两者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但是, 美国的对法政策, 却不能不说是其中的最大的失误。战时美国的对法政策, 集中概括来说, 就是军事上加以若干利用, 政治上予以彻底削弱, 从而建立并确保对战后法国的全面控制。

毋庸置疑, 战时美法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美国。美国的对法政策, 当时就引起了国内国外、朝野上下的广泛的争论。在战后, 这种争论不仅继续下来, 甚至在学界发展成一场论战。批评者, 苛责鞭挞; 支持者, 辩解维护。那么, 战时美法关系的是非曲折, 究竟是哪些主要原因造成的呢?

(一) 美国推行排斥、压制法国的政策, 最根本的原因是出于夺取战后世界霸权的需要

众所周知, 自近代以来的几百年时间内, 欧洲一直占据着世界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中心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欧洲列强开始衰弱。美国试图凭借其迅速膨胀起来的经济实力问鼎欧洲, 但威尔逊失败了。英法两个老牌帝国虽力渐不支, 但依靠传统势力和影响, 通过国联, 仍基本上操纵着国际事务, 对此, 美国是深为不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特别是战争初期希特勒连连得手的局势, 为美国取代英法登上世界霸主的地位, 展示了极其广阔的前景。罗斯福敏锐地看出了这一事态演变的深刻内涵。他决心要紧紧抓住这一良机, 在击败法西斯集团的过程中一举完成美国称雄世界、控制全球的霸业。美国的战时对法政策, 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 其间也有些摇摆, 但万变不离其宗, 那就是遵从于美国主宰法国、控制欧洲、称霸世界的主旨。1940年法国的溃败, 在罗斯福看来, 它作为一个大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国关注的是, 在政治上如何把法国和它的帝国控制在手, 在军事上如何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而危及自己。美国在处理有关法国事务的具体操作过程中, 严守两项基本原则: 第一, 在美国进入非洲、地中海地区作战之前, 法国及其属地、殖民地, 法国军队特别是海军应保持中立。当然, 这种中立是在美国的

影响下并符合美国利益的中立。第二,在两个法国(自由法国与维希法国)并存的局面下,法兰西国家的主权已经引起争议。因此,美国在涉及法国的一切政治、军事、经济问题上,坚持只同相关的地方当局打交道,即不承认任何政权机构有权代表法兰西而行使国家主权。这两项原则同自由法国运动的精神和主张是根本对立的。抵抗运动产生的前提,就是反对停战,反对中立,拒绝承认失败。戴高乐自踏上抗战之途起,最基本的目标就是把法国和法兰西帝国的一切不甘屈服的爱国力量团结、组织起来,投入到争取解放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去,同盟国一起战斗。戴高乐认为,鉴于维希政权已不能代表法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自由法国作为法兰西利益的捍卫者,有权暂时行使法国和法兰西帝国的全部主权。双方立场、观念和利益的完全相背,其结果必然是无穷无尽的冲突和矛盾。在美国看来,自由法国争取法国属地、殖民地加入抗德斗争,就是大逆不道的“扩张”;戴高乐捍卫法兰西民族利益,就是要把自己的“独裁统治”强加给法国人民。为了阻止法国可能东山再起,罗斯福甚至考虑采取两条极其险毒的措施:其一,在战后解除法国的武装,使其丧失起码的自卫能力^[1](第 542 页);其二,分割法国的领土,使之不再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将法国东北部地区,包括阿尔萨斯和洛林划出,拼凑一个所谓的“瓦隆尼亚的缓冲国”^[2](P. 447)。美国统治集团对戴高乐及其所代表的抵抗力量解放、复兴法国的努力,大肆封杀,百般阻挠,千方百计地培植自己的代理人,是因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法国,对美国战后主宰欧洲是极其不利的;美国反对、破坏法国中央政权的建立,其目的就是要把法国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由它来决定法国的命运;美国推行军事占领计划以及迟迟不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是因为一个戴高乐掌权的法国,势必会抵制、反对美国的战后安排;美国不愿法国恢复大国地位,跻身于大国俱乐部,是因为这样一个法国的存在,只会削弱美国自己的霸权。戴高乐曾经深刻地指出:“罗斯福的野心是极大的。他的智慧、知识、胆量成了他的野心的资本。他的国家是一个强国,而他是这个强国的领导人,这就使他的野心找到了出路。而战争又给他的野心造成了机会。……自从美国参战以后,罗斯福就认为和平(应)是美国的和平,应该由他独自决定如何安排,经受着灾难考验的国家应该听从他的定夺,尤其是法国,应该把他当做救星和命运的主宰。”^[3](第 82~83 页)戴高乐这番话,是他多年与美国统治者艰难交往的切身感受,它确实抓住了美国战时对法政策的本质所在。

在战时美法关系中,美国长期拒绝承认戴高乐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的合法性,拒绝承认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机构为法国政权,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戴高乐政权不是民选的。在美国的大量文件和美国领导人的众多讲话中,总是振振有词、喋喋不休地重复这样一个观点:法国的主权属于法国人民,这一主权由于德国的占领而暂时无法表现出来。美国不能让一个法国的政治权威在法国之外存在,或允许它在法国之外自行建立起来,美国的责任就是维护法国人民自行选择其政府的权利和机会。从这一观点出发,美国认为,戴高乐同维希政权的矛盾,同吉罗的矛盾,同美国的矛盾,均是因为他争夺权力才引起的。戴高乐政权究竟是合法还是非法?这一问题,不仅美国统治者长期纠缠不休,就是相当数量的法国人在起初也认识不清。不少人认为,贝当政府的行为虽然“背理”,但是“合法”;戴高乐的行为虽然“合理”,但是“违法”^[4](第 84 页)。表面上看确是如此,但表象不能代替本质。所谓民选,根据宪政原则,即人民选择代表自己根本利益、反映自己真正愿望的政府。仅从法律程序来看,贝当政府是合法的,戴高乐是非法的;但从宪政原则的精神来看,贝当政府则是非法的,而戴高乐的抵抗运动政权却是合法的。戴高乐认为,他有资格在临时的基础上代表法兰西行使权力,其理由有三条:首先,法国已“不存在任何其他合法权力”机构,而“民族利益要求有一个权力”机构;第二,“戴高乐将军是共和国最后一届合法政府的唯一”坚持抵抗的成员,“他是自由的,决不接受投降和篡权”;第三,广大的法国及法兰西帝国的人民“真心实意地拥护自由法国”,“这就是一个永久性的选举团,证明我们的权力机构是合法的”^[5](第 32 页)。戴高乐相信,他的所作所为的依据就是共和国法律的精神。其实,美国统治集团之所以对戴高乐及其政权死抱教条不放,真实意图绝不是他们要捍卫“民主自由”的原则,捍卫法国人民的“神圣权利”,而是藉此为挡箭牌,刁难和阻挠戴高乐统一和复兴法国的努力。美利坚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囿于“法统”的民族,若是照搬法统,13 州殖民地的移民就不应该起来造英国人的反。事实上,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世界上除了少数

经历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之外,绝大多数国家都还尚未实行选举制,美国不是照样同他们打交道?不是照样同他们结成盟邦吗?

(二) 美国战时对法政策是美国削弱、孤立英国,防止英国与己争霸的需要

在战争期间,美英同盟关系中双方的矛盾也是相当尖锐的。美国要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而英国则不甘心放弃这一地位。双方争夺最激烈的是由谁来控制欧洲。英国千方百计地要维持在欧洲的传统影响,它的对法政策的核心是:恢复法国的战前地位,使其成为英国欧陆均势政策的基础。1943年7月,艾登在一份备忘录中集中概括了英国关于欧洲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欧洲希望我们拥有自己的欧洲政策,并公之于世。这个政策必须以恢复欧洲较小盟国的独立和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为目标。”“在处理未来的欧洲问题上,我们大概不得和法国一道合作,甚至比和美国合作得更为密切。因而……不应允许我们的政策受到他们(美国)政策的支配。”^[2](P. 447~449)对于英国与美国彼此相背的对法政策,罗斯福是清楚明了的。他不仅看到了英国需要利用法国在战后控制欧洲、平衡美国的企图,而且意识到英法两国在维护其殖民利益上是彼此一致的。1943年1月7日,他对自己的参谋长们说,英国外交部企图组织一个由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政府,他表示“美国对此有支配权”^[1](第540页)。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罗斯福在同他的儿子谈话时说,英国人之所以竭力为法国说话,是因为他们“利害相同”,戴高乐的“身体”、“灵魂”乃至一切都是属于英国人的,“英国给他钱、物资以及精神上的援助”^[6](第66~68页)。罗斯福明白,如果让英国的如意算盘得逞,那么,美国战后控制欧洲的希望就有落空的危险。只有彻底削弱法国,置英国于孤掌难鸣的境地,才能确保欧洲在战后落入美国之手。因此,罗斯福决定,绝不能让英国掌握有关法国事务的主动权。当美国看到贝当政府靠不住时,便急急忙忙地抬出了吉罗,企图以此来抗衡“被英国人捧出来的独裁的戴高乐”。美国对坚决支持戴高乐并努力推动法国统一和复兴的艾登极为不满,每每诅咒那个“该死的英国外交部”!美国不断对英国施加压力,要它停止对戴高乐的援助和支持,甚至亮出“黄牌”——以减少对英国的供应,来胁迫英国同戴高乐断绝关系。可以说,美英两国在法国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几乎贯穿了整个战时美英同盟的始终。

(三) 控制法国属地、殖民地并夺取其中的重要战略要地是加强和巩固美国战后霸权的需要

法国败降后,美国统治者贪婪的目光便紧紧盯上了法国最丰厚的一份“遗产”——殖民帝国。罗斯福为此绞尽脑汁,苦思冥想着用什么方法来控制法国的殖民地。他和顾问、部属经过长期反复的讨论和考虑,终于抛出了一个所谓的非殖民主义的计划——以联合国家的名义建立托管制度。这种托管,名义上打着推动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自治”、“独立”的漂亮旗号,实际上是要把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的势力范围统统“托管”到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正是利用这一名目,大肆进行蚕食法国殖民地的活动。

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罗斯福严厉责备墨菲,因为他和吉罗谈判签署的军事、经济协议,规定美国保证在战后恢复法兰西帝国的完整^[7](P. 168)。1943年3月艾登访美期间,罗斯福向他介绍了美国对处理法国殖民地的详细计划。他说:“……法属马克萨斯和土阿莫土群岛将移交给联合国,分别用来作为加勒比地区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横渡太平洋的南北航空站……印度支那将交给国际管理。”至于有些很重要的地方,如达喀尔等地则由美英分别掌管,“为联合国担任警察”。艾登提出,法国一定会激烈反对这种做法。但罗斯福认为,法国战后肯定需要援助,为了得到援助,它就必须同意把某些领土置于联合国的支配之下。在场的韦尔斯提醒他,美国曾支持法国收复失地和保持帝国完整的,而且这是写在记录上的。罗斯福回答说,在战后的调整中可以修正这种立场^[8](第658~659页)。为了把法国的一些重要战略基地直接拿到手,美国以确保战后安全为借口,提出由美国对这些地区实行军事控制。1943年年中,罗斯福任命海军少将威廉·A. 格拉斯福德为其私人代表,前往达喀尔“监护”美国的利益。格拉斯福德的具体使命是,把达喀尔改变成为在美国控制下的“联合国的主要战略要地之一”^[1](第655页)。罗斯福对其军事顾问强调,“达喀尔必须成为美国在西非海岸的一个前哨阵地”。1944年7月,罗斯福当面向戴高乐表示,美国要把达喀尔置于自己的军事控制之下。美国正是出于对法兰西帝国的野心,所以对待法国属地、殖民地的政策,总是力图使其中立,反对并阻挡戴高乐把法兰西帝国组织起来重新投入战争的努力;总

是坚持同各地方当局分别打交道的方针。说到底,就是要“利用这东一块、西一块”的无主的“分散状况”,“加以瓜分”^[9](第 221 页)。

然而,在戴高乐的思想中,法属殖民地是法国“光荣历史”的一部分,法兰西“伟大”的根基之一就是法兰西帝国。失去帝国,法兰西就不成其为法兰西。在这方面,他的观点同丘吉尔完全一致,立场同丘吉尔一样坚定。戴高乐解放、复兴法国的目标、范围不仅仅是法国本土,而是包括整个法兰西帝国,他把捍卫法兰西帝国的“完整”视为自己事业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在资本主义的扩张史上,其殖民地盘的划分从来都是按照实力原则进行的。在法国战败、分裂、被占领的情况下,戴高乐对殖民地的问题尤其敏感,因为这确实是过去的竞争对手“趁火打劫”的大好时机。他对美国包括英国在这方面的一举一动,都抱有高度戒心。每当他发觉有“不轨”图谋时,总是奋起反击,顽强抗争。当然,客观地说,美法之间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罗斯福的主张比起戴高乐一味地维护旧殖民帝国毕竟多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四)认为法国无法恢复原有国力和地位是美国战时对法政策的出发点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曾哺育了北美 13 州殖民地一代人的成长,并召唤他们为建立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奋斗。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法国不仅有力地支援他们的革命,而且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作战。确实,美国大多数人民长期对法国都抱有一种好感。但是,1940 年法国的迅速败降,使美国人对法国的尊崇感一下子都消失了。在法国战败后不久,拉法叶特的后裔勒内·德·尚布伦赶往华盛顿,他向罗斯福询问:“法国能够再次复兴吗?”问话中包含着无奈,但更多的是期盼。罗斯福回答说:复兴似乎是不可能的!墨菲在 1940 年夏季的回国期间,曾试图唤起美国人对法国的同情,但却到处碰壁,许多人对法国失败的评价十分尖刻^[10](P. 150)。罗斯福认为,多年来政治上极度动荡的法国正处于分崩离析之中,年迈的贝当政权“恰好象征了这个古老而拥有历史上光荣的国家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步伐”,“法兰西永远不会再成为一流国家”^[5](第 198 页)。

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对斯大林说:“法国人民是好的,但他们需要在原来法国政府中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的、40 岁以下的全新的领导人。”他不同意丘吉尔关于法国会完全复兴并很快成为一个强国的看法,他认为“这要过很多年才能实现”^[11](第 36 页)、“至少需要 25 年的时间”^[12](P. 607)。1944 年 7 月戴高乐访美时,罗斯福毫不掩饰地向他表示了自己对法国惨败所感到的失望。1945 年 1 月,霍普金斯在向戴高乐解释美国对法政策时说:“首先是我们看到 1940 年法国的溃败和随后的投降所带来的震惊和失望。我们一向对法国的价值和力量的看法,一瞬间便被推翻了。其次是有一些法国军政领袖,由于我们认为他们是法国的代表,我们先后给予信任,而他们的表现却有负于我们的信任。……我们认为法国已经不是从前的法国了,我们不相信它能够担负起重大的责任。”“不错”,法国今天“正在复兴”,“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忘掉法国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局面呢?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法国本身还经历着政局的动荡,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戴高乐将军能够长时期领导法国呢?”^[13](第 86 页)霍普金斯这番话,当然掩去了美国对法政策的实质,但它却颇有代表性地反映了美国对法国未来走向的基本看法。美国统治者正是出于对法国无法复兴的估计,才明火执杖、肆无忌惮地劫掠法兰西的“遗产”,才极端蔑视并百般阻挠戴高乐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为复兴法兰西所进行的斗争。

(五)情报失误、信息片面导致美国战时对法政策的决策带有极大的盲目性

美国是国际政治中的“暴发户”,长期对欧洲各国的了解相对较少。在战时,美国政府对法国情况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两条渠道:一是公开的美国驻外机构;二是建立地下秘密情报网。可悲的是,美国这两条渠道所提供的情报与信息很少与事实真正相符。李海和墨菲是罗斯福钦定的对法政策的执行人。对李海的任命实在是太不高明,墨菲算是美国外交官中的佼佼者了。这两人在法国选择打交道的对象,几乎全是维希分子,或是亲维希的右派分子。正如戴高乐所言,他们“认为跟他在城里常吃饭的人就代表法国”^[3](第 9 页)。这就决定了他们所了解的情况必然是片面的、非客观的。实际上,李海和墨菲,尤其是前者,对法国的真正的政情和民情知之甚少。他们送回华盛顿的报告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惟有贝当才能代

表法国,而戴高乐则是无人拥护的。两人常常轮番,有时甚至是同时“把戴高乐描绘成一个疯子和暴君、法西斯分子和共产主义者”。整整 4 年间,白宫正是根据这些源源不断的报告决策行事的!

1944 年 1 月,美国国务院法国问题专家集体起草了一份长达 18 页的报告,报告题目为《我们不能信任戴高乐将军的原因》。该报告分为 5 大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戴高乐的过去经历;第二部分是论述戴高乐及其追随者的“反美主义”;第三部分罗列了戴高乐把追求政治权力置于战争努力之上的种种“罪行”;第四部分分析戴高乐的外交政策是仇美、仇英和亲苏的,在盟国间不断地“挑拨离间”;最后一部分是探讨戴高乐的哲学思想和政策倾向,结论是戴高乐崇尚“专制和独裁”统治^[14](第 278-286 页)。这份 1944 年出笼的满纸荒唐的文件,不能不说是美国外交史上的一大耻辱。麦克米伦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得十分率直:“有那么一些人,尽管不能用明白易懂的法语同任何法国人交谈,但却自认为是法国人心理状态的无与伦比的知心人,海军上将李海就是其中之一。甚至就在海军上将的工作班子中,对他期望最殷的人,也怀疑他是否人地相宜。”^[15](第 208 页)的确,李海在维希的任期内,形成了一种对戴高乐很深的偏见——尽管他直到 1944 年 7 月才第一次见到戴高乐。贝当说“戴高乐是叛徒”,李海对此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并不是没有听到过反对意见。赫里欧就曾对他直言:“我和我的同仁认为,戴高乐和他的运动并没有对法国犯下任何罪行,相反,他们正在为法国的生存和法国的理想而战斗。”^[2](p. 320)

墨菲在北非虽为登陆作了一定的军事准备工作,但从政治方面看,也不能不说是失败的。他在北非获取情报的主要渠道之一,是通过法国商人勒梅格尔——迪布勒伊。此人早在战前法国的法西斯运动中就抛头露面,他“大可以充当那些不仅乐意而且急于走纳粹路线的法国银行家兼大老板的典型代表”。而墨菲却认为此人是一个“勇敢的、爱国的法国人士”^[16](第 259 页)。通过这种人获取某些军事情报当然不妨,但这种人所提供的政治情报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墨菲在与达尔朗谈判签署《克拉克——达尔朗协议》时,对该协议可能引起的政治反应毫无预料,他对戴高乐和吉罗两人完全相反的估计,都足以证明当时的他在政治上所表现出的浅薄。

美国政府意识到情报机构的问题,第一次是在北非登陆之后。当时艾森豪威尔向罗斯福报告说:这里的局势“同我们以前的估计没有丝毫相似之处”^[16](第 263 页),这使华盛顿颇为惊讶。因为北非并不是敌人控制的地区,而是“一块与美国保持外交关系的友好土地”,地下活动并不会遇到多大困难和冒多大风险。况且,美国在阿尔及尔和摩洛哥的情报中心,都配备有大量的工作人员。第二次是在法国登陆以后。当时,华盛顿的特工部门将一些精通欧洲问题的学者组成一个小组,派往欧陆进行考察。这批人到达后发现:“美国当局掌握的有关法国的情报毫无价值”。他们“不知道那些情报人员是怎么搞的”,“到 1944 年 6 月还对他们说,法国唯一的有效的当局是维希政府,其实维希政府早就完蛋了。”

(六) 罗斯福和戴高乐个人关系的影响

尽管罗斯福本人否认,他对戴高乐的态度不是因个人好恶引起的,个人好恶的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11](第 654 页),但事实上很难否认这种因素所起的作用。

罗斯福对戴高乐的不信任,早在两人见面之前就已形成了。他最初认为,戴高乐不过是英国的一个傀儡而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并未认真看待这位“造反的将军”。随着戴高乐与美国的矛盾和斗争越来越激烈,他进而认为戴高乐是一个具有独裁倾向、“以救世主自居”、“心胸狭窄”的危险人物。导致罗斯福产生这种偏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美国政府内部有一批对戴高乐持反对态度的人,他们的言行不能不影响罗斯福。一个突出的事实是,在罗斯福众多的高级军政幕僚中,长时期内,惟有在前线指挥作战、同戴高乐打交道最多的艾森豪威尔一人对戴高乐抱有客观态度。美国国务院自一开始对自由法国运动就毫无好感。尤其是在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事件以后,美国国务院对戴高乐“简直是恨之入骨”。赫尔、韦尔斯总是怂恿和支持罗斯福对戴高乐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李海虽然在 1942 年从维希被调回国,但他却始终始终是罗斯福处理法国问题所依靠的“专家”、顾问。其次是情报部门的影响。如前所述,美国驻外机构和特工人员的报告总是对戴高乐大加攻击和诬蔑。特别是他们把戴高乐 30 年代初为《法国军事杂志》撰写的文章任意剪裁,寄回白宫以证明戴高乐一贯的“独裁思想”。说什么“戴高乐的部下有一种把

他当作‘元首’的复杂感情”，他在自由法国内部采取的完全是家长制的统治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一场反专制、反独裁的战争，这类报告当然会引起罗斯福的注意。原因之三是在美国的一些法国流亡者的诽谤与中伤。法国败降后，约有近 2 万法国人前往美国避难。这批人大部分是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各界名流，法统思想很重，许多人虽不赞成停战，但也反对“由一个级别最低的将军来代表法国”。这些人在美国过着舒适的流亡生活，感受不到法国社会在这期间已发生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其中有一人对罗斯福的影响很大，即法国前驻美大使、曾任法国外交部秘书长的大文人亚历克西·莱热。美国当时为了了解法国的情况，很注意倾听莱热的意见，因为他“既不属于任何党派又富有外交经验”。而莱热则把对前总理雷诺解除自己职务的怨恨迁泄到戴高乐身上，他在美国散布了大量的关于戴高乐的种种无中生有的流言蜚语。戴高乐同胞对他的这种态度，自然使罗斯福感到此人不可相信。一个足以说明问题的事实是：在整个战争期间，罗斯福从未会见过一个对戴高乐真正抱有好感的法国人。

罗斯福与戴高乐有过两次直接接触，其间共进行了 5 次会谈。凭着罗斯福敏锐的头脑和眼光，他应该有纠正前定之见的可能，至少应该部分地纠正。但是，这些会谈并没有改变他的看法。特别是在卡萨布兰卡的会面，反而使他对戴高乐的恶感加深了。他对戴高乐的反感，直到去世之前都没有丝毫淡化。1944 年圣诞节，罗斯福把戴高乐送给他的袖珍潜艇拿给他的长孙卡里斯·罗斯福玩，他的夫人埃里诺反对这样做，认为来自外国政府首脑的礼物不应当给孩子玩。对此，罗斯福不屑一顾地回答道：“戴高乐根本不是一个国家的首脑，他仅仅是法国某委员会或别的某些人的首脑。”^[17](P. 369)而此时，美国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已经有两个月了。罗斯福确信戴高乐只不过是他自己宣传的产物，在法国严酷的政治进程中将难以继续存在下去。诺曼底登陆后，第一个星期中戴高乐在法国国内的声誉越来越高的事实，并未使罗斯福相信戴高乐已是一个受法国人民拥戴的新政府的领导人。他在 6 月 14 日对史汀生说：“戴高乐将要垮台”，他的支持者“将在这事情的发展中狼狽不堪”。虽然史汀生力陈实际情况是恰恰相反的，罗斯福却仍然断言：“随着解放的进展，其他政党将会出现，戴高乐将变成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11](第 656 页)甚至到 7 月份，罗斯福还宣称：“戴高乐获得法国人民的支持还不到百分之十。”^[10](P. 163)罗斯福在无可更改的事实面前，对戴高乐的陈见仍然如此之深。

从戴高乐方面来看，他亦有自身的局限使罗斯福难以接受。首先，戴高乐的性格特点、处事方法容易加深和扩大他同罗斯福的冲突。戴高乐是从一个军人逐渐成长为一名政治家的。战争爆发前，他始终埋头钻研军事理论与军事艺术，从未涉及政治活动。“六·一八”以后，他突然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事务，他的政治外交活动十分自然地受到军人素质的影响。戴高乐脾气暴躁、性格刚直、处事简单，在面对问题时，往往缺乏协商的精神、灵活的策略以及圆滑的技巧，总是像军人那样，习惯于不断地反击、挑战和对抗。这种方式，既使人容易误解，又让人感情上难以接受。他的追随者，有些就是因为他的脾气、态度而同他闹翻，认为他“毫无妥协，难以相处”、“翻脸不认人”，以及“得理不饶人”。这种秉性，作为政治家来说确实是一大缺点。理解他的人一般不会过分计较这一点。正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在他身上，我却一直看到贯穿在史册中的‘法兰西’一词常常表达出来的精神和信念。他那种傲慢不逊的态度虽然使我感到不快，但是这种态度却是我可以理解，并且感到钦佩的。……甚至，在他表现得最为傲慢的时候，在他身上也体现了法兰西——一个有着高度自豪感、权能和雄心壮志的伟大的民族——的性格。”^[18](第 1008-1009 页)而不理解他的人，则认为这是一个骄矜自负、桀骜不驯的人。戴高乐的这一毛病，后来在他 12 年的“野居山林”期间，经过反思、省悟，终于得以克服。1959 年，艾森豪威尔在阔别多年后同他重逢，第一感觉就是戴高乐“从容不迫的信心”同战争年代那“富于挑战性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19](第 478 页)。

其次，自由法国运动内部的纷争与矛盾，也影响了罗斯福对戴高乐的看法。戴高乐初举义旗时，追随者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算得上是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在伦敦一开始集合的队伍中，自然是鱼龙混杂，免不了常常闹出些纠纷。影响最坏的是戴高乐与海军中将米塞利埃的矛盾。米塞利埃自恃军衔高于戴高乐，往往要表现出他的特殊，他把自己领导的自由法国海军看成是“私家领地”，甚至到英国海军中去搬来他的同行朋友，迫使戴高乐让步。在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事件发生后，他被美国人的“大喊大叫”吓坏了。

急忙向白宫递交了一份报告表白自己,同时大肆攻击、诽谤戴高乐^[14](第 294—295 页)。此事给罗斯福的印象极坏,在他看来,自由法国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戴高乐任命的自由法国驻美代表团团长 A. 蒂克西埃,在美数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常常发表有损戴高乐和自由法国形象的言论。他批评戴高乐及其亲信“想入非非”、“不切实际”,宣称“他们不可能做出抵抗运动所需要的大公无私的事情来”,民族“委员会十二人中只有一人支持戴高乐”^[15](第 56—57 页)。这类言论在美国广为传播,法国人自身的不团结和分裂,必然有损戴高乐在罗斯福心目中的形象。

罗斯福出身于名门望族,自幼受着贵族式的教育。他在格罗顿中学毕业后,便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早年就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养成了处事待人温文尔雅的性格。他谈笑风生,举重若轻,善于谈判,柔中寓刚。而出身于天主教家庭的戴高乐,年轻时即性格严肃,不苟言笑。家里人开玩笑说,他一定是在婴儿时被关进冰箱里了。他在军事学院的同事认为,戴高乐具有“流放中的国王”的性格。在罗斯福眼中,戴高乐这名“快攻型选手”所惯有的冷漠、鲁莽和固执,则是“缺乏教养”的表现。罗斯福步入政界后,青云直上。特别是当选总统后,推行“新政”,声名鹊起,成为世界著名的政治家。战争期间,他正处在权力的巅峰,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物。他无所顾忌,也无所惧怕,惟有美国国内的舆论才能对他有所影响。现实主义的原则使他压根儿就瞧不起小小的戴高乐;理想主义的色彩又使他那么高高在上,目空一切。而戴高乐的军旅生涯却始终不顺。从圣西尔军校毕业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本想有一番作为,却负伤成了战俘。在随后的岁月里,他潜心研究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他在世界上最早提出建立坦克机械化部队的主张。但在固守陈规、不思进取的法军内部,他因此而得罪了那些大权在握的军界元老。直到 1940 年战争打起来以后,他才被提升为准将,是年已经 50 岁整。并不顺利的人生旅途以及随后所担当的过重的使命,使戴高乐的性格更加内向。特别是他为自己规定的远大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极其缺乏,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国际强权政治的舞台上,作为弱者的他,惟有抗争,抗争,再抗争。而这种没有实力基础的抗争,在罗斯福眼中,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

罗斯福和戴高乐在气质上的巨大差异,除了他们出身、经历以及相互地位的不同所致外,美法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是因素之一。美国社会一般认为,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们比普通人有什么不同的特别之处,而是因为他们具有在普通人所拥有的共同特点之上的更高层次的内涵。所以,这些伟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而法国人则认为,伟大是源于令人敬畏的孤独和与外界的隔绝。所以,伟大人物总是威严冷峻,与众不同。戴高乐正是这样着力塑造自己形象的。他认为,一个领袖,“没有威信就不会有权威,而要获得威信,就必须与他人保持距离。”领袖的魅力存在于三种要素之中,即神秘的色彩、超人的品格和绝对的权威。戴高乐这种行为准则,在罗斯福看来,恰恰是十分危险的“独裁倾向”。

罗斯福和戴高乐并非没有共同之处。第一,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他们两人都目标远大,坚韧顽强,为实现自己的抱负,孜孜以求。罗斯福不顾残疾再度投身政治,这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他拖着身患重病的躯体,领导美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并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戴高乐从赤手空拳起家,历经无数艰难和曲折,终使法国获得统一和解放。“没有戴高乐,法国就可能经受不住二次大战中遭受失败的悲剧;没有戴高乐,法国也许就不能够从二次大战的浩劫中恢复过来。”^[20](第 95 页)遗憾的是,他们两人中谁都不能正确、客观地看待对方,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由于政治分歧而造成的隔阂。当然,罗斯福的遗憾更大一些。作为一位历史伟人,罗斯福思想开阔,远见卓识,处理问题颇富策略和手腕,在战争中曾解决了不少棘手的难题。但他却偏偏在法国问题上出了差错。20 多年后,艾森豪威尔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回忆往事,对前去探望他的尼克松说道:“在战时我们对待戴高乐是缺乏敏感的。”^[20](第 76 页)不过,此言说得太轻淡了一点。第二,罗斯福、戴高乐同不少普通人一样,彼此都缺乏宽容精神,对过去始终耿耿于怀。罗斯福对戴高乐的倨傲,只要有机会,总要刺他几句。同样,戴高乐也忘不了罗斯福对他的侮辱,战后多次在诺曼底举行的登陆纪念活动,他从未出席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已结束 50 多年了,美法关系也早已翻过那痛苦的一页。二战时期,美国霸权迅

球霸权战略的首次挫折。历史证明,霸权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发端于战时的戴高乐主义,之所以今天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其意义亦在如此

参 考 文 献

- [1] 美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2] Llewellyn Woodward.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M].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71.
- [3] 法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 2 卷(上)[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
- [4] 周荣耀·戴高乐评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
- [5] 法 拉乌尔·阿格隆·戴高乐与罗斯福[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
- [6] 美 伊利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M].上海:新群出版社,1947.
- [7] Robert Murphy. Diplomat among Warriors[M]. New York, 1964.
- [8] 英 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清算):中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 [9] 法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 1 卷(上)[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
- [10] Jean-Baptiste Duroselle.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 [11]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Z].北京:三联书店,1978.
- [12] Warren F Kimball.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Vol 2[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 [13] 法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 3 卷(上)[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
- [14] 法 尼林·E·冈·美国档案机密[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
- [15] 英 麦克米伦·回忆录(战争风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16] 美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17] Warren F Kimball.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Vol 3[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 [18] 英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 4 卷(下部),第 3 分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 [19] 美 艾森豪威尔·缔造和平:第 2 册[M].北京:三联书店,1977.
- [20] 美 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 [21] Jean Lacouture. De Gaulle, Vol 1-3[M]. Paris: Seceil, 1984-1986.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Discord between U. S. and France in WWII : Analysis

YAN Shuang-wu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YAN Shuang-wu(1957-),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French history and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Abstract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America's global strategy, its misjudgement for the French political reality and future, and the personal relations between F. D. Roosevelt and Charles de Gaulle, etc., are the principal causes of the discord between the America and France in wartime.

Key words Analysis; Discord between the America and France; Wartime